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七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山西

张雪琴
／著

开国元勋彭德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在山西这块古老而被鲜血染红的热土上，留下了他不可磨灭的光辉足迹。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7辑)

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山西

张雪琴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25 字数:300千字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73-8

G·34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挥师东征	(2)
二、初上抗日战场	(8)
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5)
四、指挥反顽斗争	(23)
五、发动“白团大战”	(31)
六、大破日军的“总力战”	(38)
七、指导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	(46)
八、留在老百姓中间的感人故事 ...	(52)
九、奉命指挥打太原	(59)
十、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	(64)

引 子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1935年10月毛泽东主席书赠彭德怀的诗章，高度赞扬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作战精神。70年过去了，这首诗仍然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不仅是对当年的彭德怀”，而且“也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

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爱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彭德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人民军队的缔造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元帅，在山西这块古老而被鲜血染红了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足迹：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春秋，他曾三度踏上三晋大地，和山西解放区军民共同战斗、生活了6年又3个半月；在和平建设的社会主义时期，他又重返故地，来山西进行了一次工作视察。新中国开国元勋在山西的革命实践，树起的巍巍丰碑，结下的鱼水深情，将彪炳千秋，永远成为激励三晋儿女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挥师东征

上个世纪的1936年的春天,在三晋大地上曾经发生了一起震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伟大历史事件,这就是由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与指挥红军进行的著名的东征山西战役。

红军东征,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向国民党发动的一次军事战略进攻。红军东征战略,从最初提出,到最后决策,前后历经了从1935年11月下旬到1936年2月上旬的两个多月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领导人就红军的战略问题,围绕战略支点、战略方针、战略方向等密切关联的三个方面内容进行了反复深入的讨论。在讨论中,西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始终“以总揽全局的真知灼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知难而进的无畏精神,主动灵活的高超谋略”,居于东征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起着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对于毛泽东关于“以发展求巩固”的红军东征战略方针,作为西革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是坚决拥护的。

为了保证红军东征的胜利进行,彭德怀以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历史使命感,就选择渡河点、掌握敌情动态、赶造渡河船只等事宜,亲率电台在无定河上下游各数十里,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侦察和准备工作。他“用了七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

敌人的纵深配备”。同时“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星夜赶造百只船”，并给“每船配备三至四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令彭德怀十分高兴的是，他悉心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准备工作，理所当然地博得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当彭德怀“向主席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后，从“渡河地点”到“时间”确定等，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对于红军东征，中共中央和西革军委高度重视，并就东征部队及其领导与指挥机关作了审慎的编组和安排。出师东征的部队是：林彪、聂荣臻所部即红一军团；徐海东、程子华所部即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宋任穷所部即红二十八军。三支精锐部队，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以西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中心组成中央局，留在陕北负责后方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做好对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以消除东征红军的后顾之忧。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红军即将出征之际，毛泽东触景生情地挥毫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随即，彭德怀和毛泽东发布了东征作战命令：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步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就这样，在中共中央、西革军委和毛泽东的周密部署下，在彭德怀的正确指挥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犹如《咏雪》词中所蕴涵的气吞山河的巨大威力，以泰山压顶和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于2月20日晚抢渡黄河，一举摧毁晋绥军防线，挺进山西，向阎锡山集团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战略进攻。只百数日，东征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在75个日日夜夜里，彭德怀和毛泽东钻山沟，过山梁，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辞辛劳，不避艰险，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胆略气魄、智慧才能，协助毛泽东指挥红军直抵吕梁，转战晋中，南征晋南，转戈北上，先后进行战斗百余次，转战59个县，扫过了大半个山西。在这过程中，彭德怀和毛泽东联名向东征红军各部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命令、训令等，为整个战役的胜利进行规定了前进方向。

当红军突破晋绥军防线，全部控制吕梁之石楼辛关至柳林三交间各渡口，占领包括三交、留誉（属中阳）、义牒（属石楼）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地区后，于2月24日，彭德怀和毛泽东即向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发布《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指出：“我方面军已胜利地渡过黄河，粉碎了阎锡山的封锁线，占领黄河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了东征战略之第一步任务”。阎锡山“正在准备着战役的进攻，企图集中兵力打击我军，救援石楼城，驱逐我军于黄河以西六十里之封锁线地带”。“目前极短时间之内（估计十天左右），我们是处在两个战斗任务之间，即渡河战斗已经完结，而进攻尚未到来。这个中间阶段的任务是集中全力准备作战”。同时，就红军各部活动区域及工作范围，作了明确部署。据此，红军各部在指定战略区开展群众工作，准备迎击来援之敌。为控制东进战略要点，于2月25日，红十五军团奉命向隰县进击，红一军团向中阳县关上村前进，并

相继迅速取得了蓬门、关上大捷，占领了隰县水头镇。此两役，红军不但重创了晋绥军，而且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五县交界的偌大地区。

为了巩固与扩大初战的胜利成果，于3月1日，彭德怀和毛泽东又向红军各部首长并周恩来、博古发出旨在“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的电令，指出：“一军团与十五军团连日的胜利，特别是关上的胜利与水头的占领，使红军取得了在山西创立根据地的初步自由”。但估计阎锡山会使用四五个师的兵力在短期内向我们进攻。“因此，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是我们现时唯一正确的口号。”“两军团主力应在以关上为中心与水头为中心的地区，蓄养部队锐气，发动群众斗争，把英勇的红军与有利的地区结合起来”。又指出：陕北吴堡、佳县、神木、府谷广大区域的恢复与占领，“使红军战略后方增加了力量。南边讲和的策略使东北军成为革命的友军，亦已达到第一步成功。这些都是大有助于主力红军的”。同日，彭德怀和毛泽东还以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呼吁：“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昭示：“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

面对红军的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阎锡山大惊失色，便一面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一面调集晋绥军从北、东、南三面向红军逼近。面对新的敌情，彭德怀和毛泽东决定“以关上、水

头为枢纽,背靠石楼,集中两军团最大主力,以连续战斗消灭其东面之两路或三路为基本作战方针”,痛击来犯之敌。于是,一场恶战即“兑九峪战斗”打响了。3月10日,红一、红十五军团奉命由交口郭家掌、大麦郊地区出发,向孝义兑九峪(现为孝义市兑镇)之晋绥军发起进攻,将其第二、第三两路纵队击溃,从而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

为着进一步扩大胜利,创立河东根据地,于3月12日,在郭家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红一和红十五军团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分兵三路,实行战略展开: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主力组成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主力两个师为左路军,北上直逼太原向晋西北行动,并掩护红一军团南下;以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方面之敌。当右路军从霍县地区继续南进,相机占领赵城、洪洞、临汾、襄陵(今属襄汾)、曲沃等县广大乡村,左路军由灵石地区北上,袭击晋祠,威胁太原,并进至兴县地区后,于3月22日,彭德怀和毛泽东分别电示林彪、聂荣臻与徐海东、程子华,命令右路军“可在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广大区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同时注意搜缴民团枪支武装游击队,创造部分苏区;要求左路军在晋西北创造苏区根据地,猛烈扩大红军,并配合在神木、府谷行动的第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打通与陕北的联系。正当三路红军胜利进击,分兵发动群众,扩红、筹资工作大见成效的时候,由陈诚率领的入晋的国民党中央军10师之众,纠合晋绥军,开始了旨在首先夺取黄河渡口,再在黄河以东分割围歼

红军主力的疯狂反击。鉴于敌情变化,于4月28日,彭德怀和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决定红军西渡黄河。电报指出:山西方面,阎锡山和蒋介石有五十一个团,取堡垒主义向我推进;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军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依据这种情况,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决定西渡黄河。按照总部的命令,东征红军于5月2日西渡黄河。5月5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和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红军东征虽然没能完全实现预期的战略目的,但它是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以后,继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苏区第三次“围剿”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也是共产党在准备抗战的历史阶段,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强大的战略进攻。整个战役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大红军

8000人，筹集款项(白洋)30余万元。从全国看，东征红军以实际行动，和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救国运动汇合起来，“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为逼蒋抗日，建立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了个好头；在西北，东征红军以抗日救国斗争的英雄壮举，促使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态度逐渐明朗坚定，初步开创了大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的政治局面；在山西，东征红军则以强大威力，从军事和政治上开始把阎锡山逼迫到进退维谷的深刻矛盾境地，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二、初上抗日战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从此开始，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伟大的全国性抗日战争时期。

大敌当前，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根据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为实现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四条保证中的第二条，即“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中国工农红军在7月下旬开始按国民革命军编组改编，兵力总计4.5万人。7月22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由总指挥彭德怀作《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是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讨论确定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彭德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

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势，“洛川会议”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总战略，并决定红军主力开赴晋绥前线，和国民党军共同进行华北抗战。“万一国民党军放弃黄河以北，红军仍然要拖住日军，坚持华北抗战，挽救危亡”。当时，进攻华北的日军已达5个师团、10万余人。而且随着时态的发展，还将继续增兵。“以3万余红军而决心支撑华北抗战，说起来，这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要求。红军将如何去实现这个战略要求呢？”在会议上，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从容地道出了他的深谋远虑和英明方略。他指出：“红军的作战地区在晋察冀之交，受阎锡山节制，红军的基本任务应当是：1. 创造根据地；2. 牵制与消灭敌人；3. 配合友军作战；4. 保存与扩大红军；5. 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他还强调指出：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但着重于山地”。围绕毛泽东提出的主张和意见，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即将身赴抗日前线的彭德怀，“正思索着红军怎样以3万之众，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打开局面，实现毛泽东提出的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接着发表意见说：‘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他

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对任弼时提出的运动、游击战问题，他说：‘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在“洛川会议”上，中央军委正式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协定，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名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后为正、副总司令），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以林彪、聂荣臻为正、副师长；第一二〇师，以贺龙、肖克为正、副师长；第一二九师，以刘伯承、徐向前为正、副师长。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作为抗日前遣队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已于8月22日出发，向山西前线挺进。随后，第一二〇和第一二九师，相继于9、10月开赴山西前线。在八路军总部尚未东渡黄河之前，彭德怀即陪同中共中央代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并林彪、徐向前一行，于9月5日先抵太原，准备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协商红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宜。此时，共产党和阎锡山建立的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为组织形式的特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将近一年时间，在全省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热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因之，当人民群众得知周恩来、彭德怀等来山西商谈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对日抗战一事时，“沿途人民夹道欢迎，送水送茶，拥塞于途，馒头烤饼，扔满车箱。”“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

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

抵达太原的第三天,即9月7日,周恩来和彭德怀、徐向前赶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前线指挥部代县太和岭口,和阎锡山进行会商。阎锡山热烈欢迎周恩来一行的到来。在会谈中,关于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地域和方针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前已同阎先生商定,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与南下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现在,第一一五师已入晋,正在侯马一带;第一二〇师即将入晋;第一二九师稍晚些时候入晋。八路军入晋部队要求以河北省阜平县为中心,将周围11个县划为八路军的活动地区。阎锡山表示,同意八路军在这一带作战,并以太行山脉和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当阎锡山谈到他筹划的防守平型关、雁门关的方略,即以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在平型关、沙河、繁峙一线上布置一个“口袋阵”,要求八路军共同防守平型关时,周恩来同意阎锡山的计划。从八路军总部出发时,彭德怀“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这对打击恐日病、鼓励抗日士气、开展群众运动都有好处”。现在,既然提到防守平型关与雁门关战事,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彭德怀,当即便认定这正是八路军首战告捷的好时机,所以,他又提出了双方配合作战的具体意见,指出:“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我一二〇师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敌进攻雁门关时,我军也从侧翼进击。”对

此，“阎甚同意”。

抵达晋东北的第一一五师，于9月19日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越五台、出长城，集结待命于平型关西之大营镇。9月21日，到达太原的八路军总部，立即召开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会议，讨论、研究山西战局和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同意彭德怀关于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争取打胜仗，鼓舞士气民心的意见”。9月23日，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县南茹村。当天，彭德怀和朱德即电令第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并且将第一一五师出击平型关的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遵照彭德怀和朱德的命令，于9月24日深夜，第一一五师冒着倾盆大雨向平型关以东急进，并在拂晓前抢占了通向平型关公路两侧的高地，设下了埋伏，决计在这里打响首战告捷的第一枪。骄横万端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先头部队第二十一旅团及其辎重，竟在平型关陷入八路军设下的“口袋阵”里，而且有1000余官兵被歼，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这一天，是9月25日。

首战平型关的胜利，是在彭德怀与朱德的部署下，八路军出征抗战以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谱写了中国抗战的新篇章。

捷报传开，举国欢腾。每一个热爱中华的炎黄子孙，都从八路军“克敌扬威”的胜利中，激起了希望，立起了信心，

鼓起了斗志，“为八路军的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官兵。行将打响的“忻口会战”，就是在平型关大捷的鼓舞下，国民党军队为坚守太原和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一次著名大战。

整个战役由国民党军队在正面阻击，八路军则展开于敌之翼侧和后方。在彭德怀和朱德的统一部署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连续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大同至忻口之日军交通线，取得了井坪镇、雁门关、王董堡、冯家沟、广灵至灵丘、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沾尚王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正面作战。

当日军地面攻击受挫后，便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狂轰滥炸。原来，以为敌机是从北平飞来的，彭德怀即“根据飞机航速、续航能力和轮番到达忻口的时间判断，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临时机场，当即下令侦察”。侦察结果，发现代县有敌飞机场。10月12日，彭德怀和朱德便电告蒋介石、阎锡山等：“代县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机运输粮弹中。”同日，彭德怀即命令刚刚抵达晋东北的第一二九师先遣队第七六九团进入代县，实地侦察。10月19日夜，第七六九团打响战斗，仅以1个小时的凌厉攻势，就干脆利索地结束了敌24架飞机和100余日军的性命，取得了火烧阳明堡敌机场的重大胜利。这是八路军继“取得平型关大捷以来又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忻口上空一度日机息影，消息传至友军营连，‘官兵闻讯，高兴欢呼：中华民族万岁！’”

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协助总司令朱德主要